



人在旅途

爱上“双城生活”

牛瑾

从天津到北京到底有多远？如果以天津南市食品街为起点，以北京国贸为终点，全程大约121.7公里。若是乘坐京津城际高铁，从天津站到北京南站，则只需要30分钟左右，你完全可以吃上一顿地道的天津煎饼果子后再置身北京，或工作，或会友，或休闲。交通拉近了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，人们每天都在上演着“双城生活”。

生活向右 工作向左

2013年，随着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不断推进，禧天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也从北京来到了天津，在天津高新区建设生产基地。就是从那年开始，作为公司行政总监的丁云英过上了“双城生活”，也逐步适应着“双城生活”。

初到天津，很多天津土话让丁云英完全不知所云。“我就靠猜，总能蒙个八九不离十。现在差不多4年了，觉得天津话听起来特别亲切，身边的朋友都说我现在也有点天津腔了。”丁云英笑得特别灿烂。

对丁云英来说，“双城生活”意味着规律地在两座城市之间游走。每周五，从天津到北京，有时开车，有时坐高铁，周末在家的她是一个和蔼的好妈妈。高铁30多分钟的行程，几乎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到了。只是，她的家在通州，从北京南站还得换乘几次地铁才能到家，花费的时间比高铁还长。每到这时候，丁云英就觉得两座城市的距离更近了。而每周一，她又会重复上述路线，回到天津的公司，做一个干练的职业女性。

当然，“双城生活”也意味着要熟悉两座风格迥异的城市。相比北京、天津的节奏要慢很多。在这儿生活久了，丁云英喜欢去五大道、古文化街这些地方转转，看看天津本地人的神态；也喜欢在工作没那么忙的时候，约上三五好友，寻觅美食，让大家都享受一番。

几年下来，丁云英已经在京津的快慢之间切换自如，但她还是觉得对家里有亏欠，尤其是对13岁的孩子。“老公因为工作的关系也不在北京，我只能把孩子交给姥姥带，一老一小的，我实在是不放心，孩子也总念叨着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才能不那么忙。”丁云英说，快过年了，可以多几天时间陪陪老人和孩子，春节过后，再在天津的公司附近租个房，方便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接过来，让他们也看看天津的美。

今年，丁云英所在的公司要全部迁到天津高新区来，到时会有更多的人上过跟她一样的“双城生活”，同样也会和她一样感受其中的苦与乐。

旅游访友 说走就走

今年63岁的蒋丽珍是浙江绍兴人，早年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上山下乡的经历，让她结识了一群天津籍的战友。近几年，她每年都会特意安排

每天有很多趟城际高铁往返于北京与天津之间，北京的最早一班6:01开出，天津是6:05，很多人从那一刻开启了一天的双城生活。

① 1月12日，C2073将于16:32从北京南站开出，乘客抓紧上车。

② 从天津来的乘客正在出站。

③ 又一趟城际高铁即将出发。翟天雪摄



时间来天津见见她们。

蒋丽珍最早一次来天津是2008年以前，当时京津城际高铁还没开通。那次蒋丽珍本来是天津、北京一游的，计划是先到天津和战友汇合游玩后再到北京。尽管京津两座城市之间只有100多公里，但天津的战友们也很少去，到了北京完全人生地不熟，又由于时间紧张，后来只能取消了去北京的行程。蒋丽珍觉得挺遗憾。

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，蒋丽珍每次来会战友都来个京津几日游。早上提前买好高铁车票，从天津出发，半个多小时到了北京，开始一天的游览，之后再返回天津战友的家里，返程车票不用早准备，最后一班城际高铁是晚上将近11点，不怕赶不上。“这都是战友们提供的攻略，去哪个景点、坐哪趟地铁、怎么换乘最方便都给我写在了纸上，他们现在对北京了解得很，有些战友的孩子还在北京工作安家，想见孩子了，也是说走就走的事儿。而且，我在北京参观的时候也不着急赶景点，总是慢悠悠的、细致地看，反正来去都方便。即使这样，几次会战友加旅游下来，也走过京津的不少地方了”。

蒋丽珍和她的战友们还建了个微信群，平常在群里问候彼此的健康、晒晒图片、说说彼此的近况。最近，天津战友戚淑珍贴出的一张新合影让蒋丽珍很羡慕。

合影里除了有6个天津籍的战友外，还有当年上山下乡时的连长。大家已经有很多年没见过老连长了，据戚淑珍说最近联系上了，老连长就住在北京大兴，天津的几个战友一合计，给老连长打了个电话，问清具体住址，转天就去了老连长家，嘻嘻哈哈聊了一整天，说的都是他们年轻时候的囧事。蒋丽珍看了照片后觉得大家都还有当年的影子，她决定必须尽快再去一趟京津，带上战友，见见老连长。

文化休闲 既哏儿又酷

北京与天津之间的物理距离与经济发展被拉近，两座城市的文化也在加速沟通。沟通中，两座城市又巧妙地避免了同质——天津有天津的韵，叫做“哏儿”；北京有北京的味，视为“酷”。在天津工作又有闺蜜死党在北京生活的董璐璐，就这样于两座城市之间找到了不同乐趣。

在天津，有空时，约上朋友去茶馆听听相声。台上，一块醒木、一把折扇、一条手绢，演员长袍一身、妙语连珠；台下，数十上百位观众品着盖碗茶、嗑着瓜子，笑声不断。天津相声茶馆多、种类多，名流茶馆、谦祥益文苑、老城小梨园、西岸相声会

馆，各有各的风格。董璐璐去过几家，观众中大多是“80后”“90后”，听口音，还有不少是从北京专门过来听相声的。“工作累，压力大，相声那就一个哏儿，算是解压了”。

当然，北京对演出资源的吸引力更大，在天津，也就总有一些想看又不得看的演出。比如，李宇春的巡回演唱会；比如，一系列的剧场话剧。每到这个时候，董璐璐都会选择到北京来看，反正离得近，反正剧目多、场次多，反正有闺蜜死党在。每次演出前后，董璐璐和闺蜜死党总是找一家口碑不错的餐馆吃上一顿，店大店小无所谓，只要不是全国连锁的就好。吃饱了、看过瘾了、聊痛快了，就拜拜再见。因为工作忙，董璐璐说这样的安排大都只能在周末，因此错过了不少很酷的小剧场演出，有点可惜。

对董璐璐来说，最近的生活又多了第三个支点——唐山。本就是唐山人的她，在那找到了一个有名的古琴大师，拜师学艺。天津到唐山同样半个多小时的高铁行程，既方便了她回家看看老妈，又保证了学习古琴的课时。董璐璐深感压力，因为身边的小伙伴们都在等着她学成后弹奏一曲呢。

瞧，这就是普通人的“双城生活”。其实，我国还有很多像京津一样被交通拉近的城市。在那里，更多的“双城生活”在不断上演，为了爱，为了梦，为了生活。

“托管班”，让人欢喜让人忧

李红光

寒假将至，北京的小学纷纷进入了半天模式，每天只上半天课轻松了孩子，却让家长们叫苦不迭。尤其对于那些平日自己带孩子又要上班的家长来说，更加左右为难，既不放心孩子一个人在家，又不能天天带着孩子上班，如何安置孩子着实让人头疼。

在这种两难境地，把孩子送到“托管班”成为不少家长的无奈选择。不过，对笔者而言，“送托管”已经由最初的无奈变成了主动选择。

由于家里老人远在外地，实在难以帮衬，因此夫妻二人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带孩子。在孩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，看着周一至周四下午三四点放学、周五半天的课程表，笔者惊诧之余不得不选择送孩子去“托管班”。

每天放学，“托管班”有专人专车到学校门口接孩子，到了“托管班”，有老师带着孩子做作业做练习，怕孩

子饿着了，还有加餐。最晚可以待到晚上6点半，这样的时间，足够笔者从容地去接孩子回家。所以，从孩子一上小学，放学之后去“托管班”就成为了固定模式，笔者也由此压力骤减，轻松许多。

其实，像笔者这样平日里送孩子去“托管班”的家长真不少。据孩子讲，他所在的“托管班”现在有十几个小朋友。有时因为特殊原因，笔者需要自己去接孩子，在门口等待的时候，也注意到有五六家不同“托管班”的老师举着牌子接学生。

越来越多的“托管班”出现，再次体现了有需求就有市场。父母下班与孩子放学之间短短三个小时的时间差，催生出了“托管班”市场。

“托管班”填补了家校空当，解决了部分家庭的后顾之忧，受到了像笔者这样的家长欢迎。而且，随着不同的需求变化，“托管班”也在不断升级，比如出现了“一对一”的学科式

托管，将接送孩子与课外班相结合，打造出一条龙服务。这类“托管班”价格不菲，却依然很有市场。

但是，就像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，“托管班”也遭遇了一些质疑和担忧。

由于家长们的初衷只是有人帮忙看孩子，忽视了其他要求，客观上导致了“托管班”的开办门槛不高，大量没有办学资质的家庭式的“托管班”充斥市场，从业人员素质不高，甚至有的卫生条件堪忧，一些不良事件不时见诸报端，从而引发了社会对“托管班”的担忧。

托管并不能“脱管”，需要有关部门不断规范引导，实现良性发展。作为家长，更需要多留个心眼，最好能实地考察“托管班”的办学条件、食物来源等，谨慎选择。

以笔者为例，在为孩子选择“托管班”时，首先选择比较有规模的培训机构，其次多次参观教室，与老师

谈、与培训机构的负责人谈，相互建立信任，再就是问清楚食物来源，当一切都符合自己要求时，才敢放心地送孩子去托管。

最近几天，笔者在单位不时遇到有同事带着孩子来上班，彼此相遇，相视苦笑，理解之情溢于言表。笔者因为有托管，暂时还能轻松几天，一旦连“托管班”也放假了，那真的要变成“灾难”了。因此，寻找一个有质量的短期“托管班”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。多方打听之后，终于找到了一个羽毛球短期训练班，虽然每天只是半天的训练，但总好过没有。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说服服了一个学期放假的孩子接受这样的安排，一番“唇枪舌剑”估计难以避免。

套用一句话“托管班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托管班又是万万不能的”。“托管班”已经深深地融入了笔者的生活，在可以预见的几年里，估计要将托管继续进行下去。

往事追忆

快过年了，又怀念起小时候家乡的豆腐。“一轮磨上流琼液，百沸汤中滚雪花。瓦缶浸来蟾有影，金刀剖破玉无瑕。”优美的文字和雪白鲜嫩的豆腐联系在一起，让人想起垂涎欲滴。

喜欢吃豆腐，因为这种古老而传统的美食里蕴藏着浓浓的家乡记忆和民俗味道。那时候，制作豆腐的方法还是由人力完成的。记得家乡有位豆腐匠人，他们一家六代都是做豆腐的，因为制作的豆腐鲜香可口而远近闻名。每天早晨，只要他的三轮车在集市上停靠下来，立刻有人在车前排起长龙，只一会儿功夫，木质的方形盘子里就空空如也，他一边撤下空了的木盘子，一边掀开另一个木盘子上的厚布帘子，一盘雪白水嫩充满光泽的豆腐就露了出来，上面还冒着热气。

听老人讲，做豆腐是个苦差事：“天下有三苦，打铁摇船磨豆腐。”豆腐不仅好吃，整个制作工艺也是十分讲究的。筛选黄豆、泡黄豆、磨黄豆只是前期准备工作，磨好的黄豆把渣子过滤掉后，放入大锅中煮沸，这是我们常喝的豆浆。真正做豆腐的关键环节，也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就是“卤水点豆腐”。之所以说加卤水是做豆腐的重点，是因为这道工序很考验匠人的手艺，卤水不能加得太快，否则做好的豆腐就会失去细嫩，加得太慢也会影响豆腐的口感。不同浓度的豆浆，真正有手艺的豆腐匠只要用舌尖试一下，就可以判断卤水的浓度是否合适。

别看只是一块最普通的豆腐，也要不断琢磨和实践才能将这门手艺做到极致。前段时间看到一条消息，吉林省召开了第一次工匠文化研讨会，专门请来了豆腐匠人杨德新老人，今年63岁的他已经做了54年豆腐，但是他对未来感到很茫然，“人工做一次豆腐，磨豆浆、过滤豆腐渣、压水分等等，很费劲，一天顶多做上三四盘。现代科技已经使豆腐实现了流水线生产，各种电气化的磨浆机、甩浆机、压干机将豆腐制作从泡黄豆到出成品一条龙生产，连家用豆腐机也被研发出来，老百姓在家里就可以轻松制作豆腐，我们的手艺还有传承意义吗？”

这样的困惑，正是当下很多传统手工匠人的集体痛点。尽管很多匠人把自己的手艺当成一种信仰、一份坚持，但是当时代的变迁轰然而来，这些工匠都要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了，还能留下什么呢？难道只有专注、严谨、细致的工作态度这个精神财富吗？

我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豆腐的故事。远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齐伯镇光明村的豆腐匠人陈贵忠，也在坚持用传统工艺做豆腐。从市场销量和老百姓口碑中，他更加坚信磨豆腐必须用传统工艺。为了保障品质并提升产量，他还想动员全村人和他一起做豆腐：“最好的水源、最传统的工艺、最认真的态度，就凭这三个‘最’，就一定会把齐伯豆腐的品牌打响。”

其实，做豆腐和做其他事情一样，可以往专了做，也可以往宽了做。对于这些传统手工制品，最好的生存方式就是不断创新、不断拓展。譬如延伸产业链、开发豆腐干等更多相关产品，或者为豆腐编织一个美好的故事，依托电商平台让它飞出深巷，家喻户晓。

很久没吃过家乡的豆腐了，不知道它的味道有没有变。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做这些传统手工制品的忠实粉丝。

代步车真该禁了

余颖

为了接送外孙女上幼儿园，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丁阿姨刚花3万多元买了一辆老年代步车。不用摇号，不用驾照，还不用等红绿灯，三四站地的距离，10分钟就到，丁阿姨觉得很方便。她注意到小区里这样的代步车越来越多，基本上都是加了一个塑料壳的电动四轮车。

可最近，丁阿姨在小区门口目睹了一场车祸：一辆代步车被转弯的机动车一碰，立刻飞了出去，车里的乘客全部受了伤。如果是两辆机动车相撞，绝不会这么严重。这让丁阿姨不禁担心起来，老年代步车真的安全吗？

有这样疑问的消费者不在少数。近年来，全国各级消协收到有关代步车质量安全的咨询和投诉显著增多。近期，中消协购买了“金马”等品牌代步车，并委托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做了安全性碰撞试验。

试验结果让人心惊——金马牌代步车在碰撞过程中座椅与车身脱离，假人直接撞击方向盘和风挡，而且前排内饰破裂产生大量碎片，可能导致乘车人员大失血。试验的碰撞速度只设定为每小时32公里，低于大部分代步车在现实中的行驶速度。碰撞也只测试了代步车行驶中正面撞击前方壁障的情况，没有考虑在城市交通中与速度更快、质量更重的机动车发生碰撞事故的情况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代步车在实际行驶中发生交通事故，后果可能比碰撞测试还要“大出血”。

早在2013年，中消协就发布消费警示《老年代步车存在严重安全隐患》，建议查处遏制老年代步车。但是近年来，代步车不仅没有退出市场，使用地区、人群、数量反而不断扩大，给交通安全带来严重隐患。

如今，市场上的代步车价格已经赶超微型汽车，比如测试中购买的大阳牌售价40400元，但是在安全防护措施、质量标准等方面非常落后，很容易发生安全事故。消费者在驾驶过程中出现交通事故，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，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看到中消协的报告，丁阿姨吓了一跳，决定以后还是让女儿开机动车接送外孙女了。